

● 政治学理论

全球化与民族主义: 一种现代性理论的阐释^{*}

白 锐

(武汉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白 锐 (1970-), 男, 贵州遵义人, 武汉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政治与行政学系博士生, 主要从事政治学基础理论及政治哲学研究。

[摘 要] 在现代性扩展的过程中, 全球化与民族主义构成了一对矛盾。全球化深刻地影响着世界范围内人类社会的组成模式, 而民族主义则是民族国家内部对全球化的反映, 体现出在经历这一变动的民族国家的社会结构中, 一些群体可能表达的权力与利益诉求。

[关键词] 现代性; 全球化; 民族主义

[中图分类号] D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999(2001)06-0701-07

全球政治、经济、文化交往达到空前程度的事实, 使得全球化 (globalization) 这一概念应运而生, 成为学术专著、报刊杂志、街谈巷议的高频率词汇。同时, 与全球化不无联系的是,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随着原来的两极格局的崩溃, 国际舞台上一系列突发事件的出现, 国际政治的格局陡转突变, 民族与地区差异日益显现, 一些旧有的民族矛盾与冲突不断激化, 民族主义 (nationalism) 又成为学界热论的议题。在世纪之交, 全球化在获得罕有先例的规模之时, 也遭遇着前所未有的阻力, 民族主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作为全球化的对抗力量, 从冷战的蛰伏状态走了出来。这两个表面上相互矛盾的现象并生并存, 显示新的时代可能带上不同于从前的新的特质。然而, 这个时代并非是脱胎换骨的“后现代”的, 全球化是现代性 (modernity) 的明确体现, 人类社会的现代历史在发展过程中还没有发生这样的断层。事实上, 无论是全球化, 还是民族主义, 都体现出受现代性塑造的世界政治正经历着深刻的变化, 我们会看到, 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的内在冲突正是现代性引导下历史的辩证发展所在, 并且或许在这种矛盾之中, 正孕育着人类社会新的生活形态。

一、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的历史动力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 以及伴随发生的民族主义复兴, 已经显示出人类社会政治生活形态的重大变化, 这一变化影响之所及, 不单单由于交通、通讯技术等等的原因, 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 而且沿袭至今的民族国家的既定体系, 也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转型时期, 全球化正在逐步改变人类社会的生存模式。全球化是一个复杂的历史现象, 它包含了政治、经济、文化等等的因素, 发生于不同的层次。从严格的意义上说, 虽然在更早的时候已初见其端倪, 但总体而言, 全球化是一个“冷战”后才大规模显现的现象; 同全球化相比, 民族主义则发生在较早的历史时期, 同民族以及民族国家的产生有密切的关联, 最近十几年来更随着全球交往模式的转变与一些民族和国家的逐渐边缘化 (marginalized), 在国际政治学界

* 收稿日期: 2001-03-09

日益受到重视,引发许多争论,成为另一个人们关注的焦点。

全球化与民族主义都是被巨大的历史力量所塑造出来的阶段性的产物,这股历史力量的动力就是现代性,是人类追求社会及自身发展的历史体现。现代性指的是,人类追求理性的社会结构形式和个人生活方式的努力,这一过程最早出现在近代的欧洲,并随着世界社会的逐步形成而带上普适性的特征。任何新的社会结构与意识的出现,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准备阶段,全球化也不例外。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人们交往的不断深入,终将不可避免地把世界送入一个具备新的社会条件的时代。这个时代虽然同过去有着必然的联系,但全球化与以往的各国相互交往不同,它的出现直接地针对着民族国家的现有格局。全球化来势之猛,威胁着主权国家的独特地位,国内政治的外向性已经明显地增强;国际社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已不只是一个主权国家俱乐部,世界范围内的拥有各种成员的市民社会正在形成。更重要的是,全球化最主要的特征,不在经济方面,也不在文化方面,而在于人们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和交往方式的变革,全球化这一名称已经暗示,全球化时代必然构成对民族国家的极大冲击,然而作为对全球化的回应,也必然形成民族主义运动和情绪的回潮。谈及全球化,有不少人都会提到马克思的一段话:“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第 276 页)从这一句话里,我们清楚地看出两层意思:第一,世界性的生产与消费行为是推动全球交往——无论是物质交往,还是精神交往——的真正动力,也就是说,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今天全球化局面形成的实质原因,而这种追求物质文明和个人解放的社会发展,是现代性最典型的特征;第二,全球化在本质上是一种解构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历史洪流,它的每一次进展都会和民族、民族国家产生不可避免的冲突,这一冲突是作为历史发展逻辑的现代性的必然矛盾。有人曾经说过,国际关系的实质是一个从暴力到谈判,再从谈判到法律的文明发展史。这句话的正确之处在于,它表明了世界的存在最终需要一系列的规则或者标准,而全球化正是通往这些关于价值和制度原则的规则或标准的一个阶段。

全球化的复杂,还在于它不是一个单一的线性发展过程,它发生于从政治、经济到文化甚至个人心理归属的各个层面,无论全球化进程所涉及的地域之宽阔,还是领域之广大,影响之深入,都足以让人认识到全球化为什么被称为“宏大叙事”(le Grand Récit)。如果我们要参与这场叙述,又该如何说起呢?

二、全球化剖析

(一)关于全球化的争论

或许是因为全球化是一个人所共知的流行词汇,围绕全球化展开的论战愈加热烈。大致说来,人们在全球化问题上无外乎两种看法。第一种是把全球化看成前所未有的历史现象,它已经带来整个人类社会的革命性变化,是正在形成的对传统民族国家体系的极大冲击,一个新的世界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逐渐成形,全球化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现象,也不是代替后冷战格局的另一种世界体系,而是关于人类生存时间和空间的转变,它既是一种宏大历史的展现,又是极端私人化的体验^[2](第 4 页);第二种意见认为,全球化不过是一个神话,目前的人类社会仍然是以民族国家为基本的构成单位,即使国际经济合作一般也是以国家作为成员,摇滚乐、可口可乐这样一些物质以及技术的指标并不意味着全球政治格局的消解,各国的经济交往本身就说明,世界市场经济的最大参与者是各个国家。全球化有时候不仅仅是神话,甚至可能是一个陷阱,也许“还不只是经济表象掩盖下的政治陷阱,而是经济掩盖与政治设计共同营造的文化陷阱。……陷阱不单潜伏在人类的经济战场之下,也潜伏在国际政治关系之中。而且,人类为担负这种政治风险所要付出的代价,很可能要远远高于担负经济风险所要付出的代价。”^[3](第 6 页)在第一种看法中,有人突出以建立一个世界大市场为中心的经济全球化的意义,也有人强调政府在推进全球化

过程中的作用。在无论哪一种意见里,都既有新自由主义者,也有保守主义者和左翼学者的声音。关于全球化的种种复杂的意见,不一而足,但是各种说法多归于以上两类,或介乎两端之间。上述的两类看法都可以提供充分的理由来证明自己。而事实上,两者都确实把握住了一些真相。全球化确实已经由于远程即时的通信和越来越便利快捷的交通、世界各地人员及物质的交流、人们生活方式的互相影响而到来,否则何以说明一种名叫“ I love you”的电脑病毒会使全球各地的政府部门、企业以及个人谈“爱”色变,又何以说明一次金融危机会引起亚洲乃至世界各国的经济地震,即使我国采取了一系列的规避措施,仍能感觉到它对国内市场和就业机会有着震荡。但是,如果全球化只是各国在各方面交往的增加,那么它和 19 世纪的国际格局又有什么区别呢?不过是交流的多少和频度而已,如此说来——正如一些前辈学者指出的那样——全球化早在 500 年前的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时就已经开始了。^[4](第 13 页)

(二)全球化的结构特征

全球化的根本动因在于世界范围内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现代性构成这一发展的主题。不少的西方学者认为,全球化的实质是西方化(Westernization),是西方式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和文化方式在世界每一个角落的胜利,然而全球化并不是这样简单的一个现象。诚然,现代性是西方社会发展的独特的逻辑,由于大工业在全球的拓展、西方理性主义的科学知识及方法的普及、市场自身的扩张性等等原因,西方的文化及制度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影响。但是,这一过程一经展开,它就不再是从中心到边缘、从高处到低处的单向输出,而是一个世界级的市民社会的开端。就是在欧洲和美洲,现代性也没有一致的样板,每一个工业社会都只是提供了一种现代性的可能性而已,历史本身充满着许多的不确定性。现代性不再可能只是西方式的发展逻辑,它已经被新的全球交往模式改写,全球化的进程自始至终都由世界社会在推动前进。

现代性所引导的历史,在其发展过程当中,总有一些阶段性的结构特征,全球化在目前的情形下也显现出一些结构特征。当今的全球化研究中,概括全球化结构特征较为深刻、颇具说服力的,是安东尼·吉登斯的理论。在吉登斯看来,全球化不是跨国贸易,也不是出现一个世界政府或者类似的全球性政治组织,而意味着“时间和空间的转变”,或者时空的压缩。吉登斯对全球化的观察,与他的宏观社会理论是相一致的。如果以时空要素来说明全球化还显得有些抽象,以城市为例或许就明白了:“传统城市的情境特征在许多方面都不同于现代的城市化现象。……时间的商品化启动了工业生产的机制,瓦解了阶级分化社会中特有的城乡分化。现代工业伴随着城市化的扩展,但现代工业的发展却并不一定局限在某种特定类型的地区中。而另一方面,传统城市是阶级分化社会中纪律权力的焦点,同时也由于这种情况,它们往往和乡村相分离。在那种社会中非常常见的一种现象,就是通过城墙,以物质或符号的方式确定这种分离。伴随着时间的转型,空间的商品化也建立了一种特征鲜明的‘人造环境’,表现出现代社会中一些新的制度关联方式。”^[5](第 239-240 页)实质上,时空的压缩表明的是,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中,物质世界现在开始逐渐地消解了。人们已经可以在互联网上购物、求职,甚至恋爱、谈婚论嫁的年代,人的际遇已经可以超越物质层面的阻碍而发生重大的改变。现实环境的重大变化,自然带来了“制度关联方式”的革命。全球化的结构性特征,正是明确地体现在这种时空的压缩里。

(三)全球化的政治经济意义

毫无疑问,时间与空间的转换,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在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将产生持久而深刻的影响力。一直以来,作为人类社会生活中最有力的角色的民族以及民族国家,有几个相关的要素,而这些要素都在全球化的结构转型中,受到极大的动摇。在汉语里,国家的“国”字,表示一定疆界以内固定的地域,这表明,人们早已意识到国家的一个重要前提——领土。西方典型的民族国家观也认为,国家的一大要件是领土,数百年来的国际关系史,领土的争端构成最重要的起因。然而,在全球化的时代,时间和空间的转换正在解构民族国家脚下原本最坚固、最稳定的基础。其次,时空结构的转变,在政治形态以及政治治理的规模与技术上,也将产生相应的变革。如果国家越来越成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而世界社会不可能同个人发生日常的联系,那么全球化的政治生活或许是更加个人化、社区化的体验,政治的个

人已经从民族国家这一点上向世界和个人两个极点拓展。政治生活的非政治性质在全球化时代逐渐显现出来。全球化时代到来的条件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因而经济全球化是引起许多思考的一个问题,在这个方面,全球化学者的基本共识是,经济全球化即意味着市场经济的全球化,意味着市场经济规则的全球化。而市场经济的规则,对个人的身份认同、地域归属、民族意识等等构成挑战。而事实上,经济全球化还只是全球化的一部分而已。不过,同国内市场经济本身一样,经济全球化也是问题与机遇同在的。如果说市场在没有政府介入的情况下,可能既不会有经济上的实利,也不会有道德或者社会公正上的正义,那么经济全球化也一样是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的。有识之士对于这一点不乏卓见:“经济全球化……既加快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又在全球范围内扩大了贫富差距。新兴市场的不稳定性对发达国家也产生了强烈冲击。如果有能有效地控制它的消极因素,发展中国的经济将可能陷入困境,发达国家最终也难以独善其身。”^[6](第Ⅲ页)显然,全球化问题的解决只能在世界各国的合作,尤其是在南北方国家的合作下进行,全球化为这些问题的解决准备了条件。比如说,各国为了避免类似亚洲金融危机这样的事件,所采取的对国际金融市场进行国际监管等等措施,只有在全球化的制度框架及技术条件下逐步地展开。

(四)全球化的矛盾性

全球化无疑还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历史进程。首先,当影响人们的各种硬性的或软性的政治约束力从民族国家向全球一级延升的时候,本土的、社区的政治生活地位也凸显出来;其次,地区之间的差异相当明显,当欧洲一体化的进程越来越快,甚至个人认同已经从国家公民向欧洲公民转化的时候,非洲及其它几个国家几乎还没有进入全球化的行列,仍被悬置在一个边缘化的位置;再次,区域化成为全球化过程中的复杂现象,它一方面是全球化的整合(integrating)力量,另一方面又是其中的瓦解(disintegrating)因素。一般地说,区域性结合比全球化更具有市民社会的属性,它究竟是全球化的补充,还是全球化的严重威胁呢?显而易见,全球化不是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其种种矛盾在现在的国际关系格局中,会引起许多强烈的回映。在全球化逐渐地模糊政治与经济的界限、国际与国内的界限时,无论是国际标准国内化,还是国内标准国际化,全球化的这一初始阶段必然会带来各国利益关系的变动,从而导致对全球化的抵制。在西雅图会议期间,抗议会议的事件和这次会议本身一样地引人注目,这一令人记忆犹新的事件显示,全球化的发展势头正遭受着强劲的抵制,有不少的人开始加入反对全球化的行列。

在反对全球化的人士当中,除了环保主义者、边缘化人群、原先的受保护行业从业者、一些特殊的工作人群等等这样的群体外,还有民族主义者。如前所述,目前全球化在政治学意义上令人注目之处在于,多领域、多层次、跨国界的人员、物质、信息流正在缓慢地溶蚀着民族国家的制度构架与相应的政治文化。如果国家的神话一直以来被讲述得激动人心的话,正是靠了民族主义这种娓娓动听的语言。民族主义是民族国家的灵魂,它曾经表达了一个民族或者民族国家的利益要求,表面的情绪化行为也可能透露出一些关于人们的理性思考的实质内容。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主义体现了一种利益的格局。

三、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主义

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主义复兴,是民族主义自身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回顾民族主义的历史可以清楚地了解,作为人类社会最重要的政治共同体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表达出了民族国家明确的政治愿望,有其一贯的权力诉求,它反映了民族国家内部一种特定的利益关系,一旦这种利益格局受到威胁,它自然会有强烈的表达愿望和表达方式。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主义正体现了这种逻辑。

(一)对民族国家的简要考察

显然,民族主义的发展同民族与国家的历史演进息息相关。通常地,民族被定义为一个“形成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7](第 255 页)。因此,我们所讨论的民族,是政治学意义上的民族(nations),而不是民俗学或者人类学上的民族或种族(ethnic peoples)。这一点同我们口头语言所谈论的民族是有区别的。民族带上这一层色彩,是相当晚近

的事情,也正是民族的政治意义,使民族具有了重要的地位。现代意义上的民族的出现和发展,本身就是现代性延展的一个过程。

近代意义上的国家,即民族国家(nation-states),是世界历史发展近代化乃至现代化的产物。1648年,欧洲的“三十年战争”结束,随后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Westphalia Peace)标志着近代意义上的主权民族国家的诞生,主权理论的出现为国家的神圣性增加了学理说服力。只有国家的出现才催生了民族主义,但是国家的产生并不意味着民族主义的同时产生。对于民族主义心理、思潮甚至势力的形成时间,众说不一。民族主义的产生应当是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欧洲。1789年大革命以后,法国相继实行了一系列国家主义的政策,如国税制、警察制、兵役制等,刺激了民族主义心理的产生,到拿破仑时代,法国民族主义空前高涨,同时随着拿破仑的征战,欧洲其它民族的民族意识也渐渐觉醒。19世纪的欧洲,民族国家体系既已确立,民族主义情绪便日益形成,这是民族主义的第一个高潮。第二个高潮出现于“一战”之后的几年,民族主义思潮迅速传向世界。各殖民地人民的民族意识迅速形成,民族主义思潮在世界范围内第一次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民族国家格局与民族主义文化的发展,最终达到了民族主义的顶峰,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场迄今为止人类最大的战争。20世纪90年代,随着冷战的结束,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民族主义再次获得表达的机会,虽然有人断言民族主义到了现在,已经开始式微(第196页),但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主义,却和过去的民族主义一样,仍然有着深刻的社会基础,体现的是市场全球化这一趋势中的利益矛盾。

(二)全球化进程中作为利益诉求的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同全球化一样,是一个宽泛的用语,其指称对象很不明确。我们不妨从几个层次上对民族主义进行剖析。

在浅层意义上,民族主义首先指的是人们在情感上对本民族的认同,是非理性冲动在地理归属感上的表现,并不断从情感本身获得对归属感的证明,因而民族主义在性质上倾向于产生不断强化的大众情绪。这种情绪是好是坏,则视具体的历史环境和民族主义的具体政治诉求而定。但某些时候民族主义情绪的力量极大,影响也深。例如,某些极端的民族主义者为了狂热的民族主义信念而进行持久而坚定的反抗运动,甚至是自杀性的恐怖主义活动,就是民族主义情绪的极端表现,其政治后果不言而喻。

从深层意义上说,民族主义标明了人类社会文化及宗教形态的多样性及其互动关系。即,民族主义情绪背后,持续而强大的支撑力量是文化,是各民族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的不同,是由符号、价值、象征等元素组成的传统文化的差异。文化本来并不一定是排他性的,但文化如果同与民族国家相联系的民族主义结合,则文化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内涵,获得与众不同的表达方式。一些学者认为,对某种文化传统的坚持,甚至可能跨过意识形态的阻碍,亨廷顿即作如是观:“20世纪末中国的政治领袖像西方的社会学家一样,赞美儒教是中国进步的根源。80年代中国政府开始提倡对儒教的兴趣,党的领导宣称它是中国文化的主流……华人领导人都从其共同的中华文化而不是引进的西方观念中寻求合法性。”^[9](第107页)不仅中国如此,全世界所有国家的民族主义情感或政策都植根于传统的文化价值,挖掘自身有特色文化符号与象征,而这样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反过来证明传统文化的观念和推行传统文化的民族国家的合法性。这就是所谓民族的情感合法性(the emotional legitimacy),这个情感合法性,以情绪、感情为显现方式,内核却是文化层面上的民族与国家认同。

从实质意义上分析,民族主义有其明确的权力诉求。在没有国家的时候,民族主义情感、运动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建立一个民族自决的国家;在国家建立以后,民族主义情感、文化又成为实现社会动员、团结社会力量、维持政治权力的工具。从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共生关系上,我们可以看出,民族主义实质是民族渴望主宰自己命运,民族国家急于显示自己独特性的文化表达;而民族国家是民族主义的政治成果,是文化的外化。这样的历史例证是不少的,犹太民族主义就是其中之一。它是和锡安主义即犹太复国运动紧密联系着的。犹太人被迫离开故国已有2000多年历史,在欧洲各国自古以来饱尝反犹、排犹运动之苦,于是在19世纪欧洲各国民族主义成熟时期,也同时是在欧洲各国排犹活动愈演愈烈之时,犹

太人学者形成一种思维,认为犹太人应当回到自己的祖国,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犹太人的祖国即当时的巴勒斯坦地区。1895年,维也纳犹太人赫茨乐写成《犹太国》一书,将锡安主义理论化、具体化,1897年随即在瑞士巴塞尔召开了第一届犹太人代表大会,明确地提出要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犹太人国家。“二战”中希特勒的纳粹德国疯狂地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的屠杀,这遭遇更坚定了犹太人复国的决心。

1948年5月,以色列建立。从锡安主义思潮出现到形成犹太国家,只有不到100年的时间而已。像犹太民族主义的产生,是民族生存空间和情感空间加上文化、宗教因素将它催生出来的,从本质上说,仍然是一个民族的生存选择。如果说民族主义是在特定情形下的一种利益表达,那么,政治上的追求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民族国家的形成,是民族主义的必然逻辑。民族国家既已成立,民族主义又可能纯粹成为一种政治策略,是民族国家自我神化的语言。如“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塑造出天皇作为日本的政治权力象征,并大力推进神道教作为国教的速度,且利用传统的文化符号和价值,培植一种大众情绪,使民众认为日本民族是优秀的民族(此处的民族是从种族意义上说的),应当占据领导世界的位置,于是,日本政府在采取一系列国家主义政治措施的同时,培养出日本的极富特色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文化。民族主义的政治功用显而易见,民族主义思潮固有的权力诉求再次昭然若揭。

全球化进程深刻地影响着全球社会的时候,也正翻动着适宜民族主义生长的政治土壤。曾经备受学界关注并引起热烈讨论的“文明冲突论”,说明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人们对文化问题的讨论,都以国家利益为依据,文明冲突的实质是国家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正因为如此,文明冲突的理论和反驳文明冲突的理论才在冷战以后应运而生。显然,全球化对民族主义的刺激,最先在文化的层面表现出来。同时,全球化将对民族国家的政治与经济结构形成不小的影响,而每一次震动都会改组国内的权力和利益结构,受此威胁的群体及个人在寻求自我保护时,最方便也最具合法性的政治旗帜,就是民族主义了。

四、结 语

国际政治的现实情形是,民族国家仍然是人类最基本的政治生活单位,主权原则赋予国家一种不可超越的神圣性,在民族国家之内,中央政府掌握着最高的权力。在国家以外,没有一个超国家的组织。联合国曾经是人们为了规范国家行为而进行的国际政治制度上的尝试,但是其地位近年不但没有得到加强,反而被削弱。1998年底,美国和英国绕过安理会对伊拉克的空中打击已经成为联合国地位下降的标志。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化还只是一个发展的态势,全球化对世界社会的结构性转换,现在并不是已经完成,而只是刚刚开始。有着一定历史渊源的民族主义,以文化传统作为其基础,表达特定的利益要求和权力诉求。随着民族国家交往沟通的日益频繁、深入,民族主义便日益高涨,可以说正是民族国家的相互意识进一步刺激了民族主义的发展。民族国家为民族主义提供了制度框架,历史的民族主义也为全球化背景下现实的民族主义提供了传统意义上的合法性;而世界各国总体生产力水平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的不均衡性,加上市场向全球范围的扩展,市场主体的国际竞争进一步激烈,则为民族主义在全球化时代的复兴奠定了经济的基础,明确了政治的目标。显然,全球化和民族主义是同时展开的,而两者之间的矛盾正是根源于利益格局的极大变动。在全球化时代里,民族主义将仍然作为全球化的逆向因素而存在,以旧的语言诉说新的内容。

参 考 文 献

- [1] [德]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 [英] 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M].李惠斌,杨雪冬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 [3] 万俊人.全球化的另一面[J].读书,2000,(1).
- [4] 李慎之.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及其价值认同[A].俞可平,黄卫平.全球化的悖论[C].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 [5] [英] 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M].李康,李猛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

- [6] 汪道涵. 全球化与中国经济 [A]. 哈贝马斯, 等. 全球化与政治 [C].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0.
- [7] 中国大百科全书. 政治学卷.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2.
- [8] [英]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民族与民族主义 [M]. 李金梅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 [9] [美] 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M]. 周琪, 等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8.

(责任编辑 叶娟丽)

Globalization and Nationalism A Theory Modernity

BAI Rui

(School of Politics & Administration,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BAI Rui (1970–), male, Doctoral candidate, School of Politics & Administration,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political science.

Abstract In the course of the expanding of modernity, globalization and nationalism emerge as two conflicting historical forces. While globalization is fundamentally changing the structures of the human society on a world scale, nationalism acts as the reaction to globalization on the nation-state part, indicating the political attitudes of some groups within nation-states when the social structures experience the transitions caused by globalization.

Key words modernity; globalization; nationalism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有 16 篇论文获 2001 年湖北省专题优秀文章奖

由湖北省委宣传部领导、省社科期刊研究会组织的 1999–2000 年度专题优秀文章的评选结果揭晓。武汉大学文科学报编辑部报送的 16 篇文章, 全部获奖。具体获奖情况如下:

一等奖: 1.《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作者: 陈昭方, 责任编辑: 邹惠卿)

2.《保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思考》(作者: 辜胜阻、魏珊, 责任编辑: 邹惠卿)

二等奖: 1.《论邓小平政治思维的基本特征》(作者: 丁士松, 责任编辑: 叶娟丽)

2.《邓小平的政治观》(作者: 熊启珍, 责任编辑: 叶娟丽)

3.《高校文科学报编辑之素质说》(作者: 车英, 责任编辑: 叶娟丽)

4.《移风易俗与英国资本主义的兴起》(作者: 向荣, 责任编辑: 张琳)

5.《后现代主义与人文精神的重建》(作者: 赵凯荣, 责任编辑: 严真)

三等奖: 1.《什么是人文科学》(作者: 李维武, 责任编辑: 严真)

2.《当代中国婚姻状况结构变迁》(作者: 罗萍, 责任编辑: 车英)

3.《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的政治学解析》(作者: 胡象明, 责任编辑: 叶娟丽)

4.《市场经济、市民社会和民主政治》(作者: 储建国, 责任编辑: 叶娟丽)

5.《社会稳定及其基本特征探微》(作者: 汪信砚, 责任编辑: 严真)

6.《论邓小平关于大局即政治的思想》(作者: 叶娟丽, 责任编辑: 吴友法)

7.《国际商事仲裁中的友好仲裁问题》(作者: 郭玉军, 责任编辑: 车英)

8.《按生产要素分配与劳动价值论》(作者: 余陶生, 责任编辑: 邹惠卿)

9.《从交易成本的角度看贸易模式、经济发展和二元经济现象》(作者: 张定胜、杨小凯, 责任编辑: 邹惠卿)